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 【史实辨析】 |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及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 |
| |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 樊能廷 |
| 【亲历者说】 | 一位老红卫兵回忆文革砸全聚德 | 金 汕 |
| 【拒绝遗忘】 |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三） | 王复兴 |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浅谈北大武斗所用器具及给学校造成的财产损失
——《北京大学纪事》正误与补充

• 樊能廷 •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纪事》）是文革后，北大官方动用大力气、大资源，由荣休的校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效挺领衔，花了十年工夫，编纂的北大一百年“官方修史”，很精心、很讲究。笔者节选1966年6月—1968年9月这部分，4万2千7百字，书上几乎一个错误标点都没有。仅见“宫香政”错为“宫政香”，是唯一的文字错误。另外，把昔日的32路汽车记为现在的332路；把宿舍多少号“斋”记为现在的多少号“楼”，则是口语中随着时间推移的嬗变，不算舛误。

笔者从《纪事》100年的篇章中，节选1966年6月—1968年9月这部分（文革主要阶段）资料，它道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供研究者使用。对于自己工作的文字要求是，“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易一字，不错一字”，可能已经做到了。笔者不把指误、阐发，作为节选秉文的任务。比如，该书讲聂元梓去上海“串连、造反”前的事情，真实情况是王力派王广宇从阮铭家把聂元梓接到花园路中央文革记者站住宿。但是《纪事》成书的时候，这些史料还没披露出来，《纪事》记述有误，可以谅解。

如今，笔者读到该书1980年3月19日的记述，引起不少回忆和思考。《纪事》说：

“按照1月30日市委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开始，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

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的武斗还损坏了在“五四”运动场的20万红机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基础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他们还从建筑材料中用了4吨1/2英寸镀锌管做了长矛。1966年我校有双层木床5300张，到1970年只剩下2300张，损失3000张。估计损坏四屉桌600张，留学生用大衣柜200个，椅子270把，书架250个，大二屉桌240个。还损失毛巾500条，棉衣600件。”〔1〕

这一段文字，对于北大武斗的房产部门物质损失，做了数量的统计，本文拟对此相关情况进行一些补充与纠正。

一、长矛、铁棒

长矛是锐器，铁管制成，锋刃是“麻花钢”（建材“螺纹钢”）磨削、焊接在杆上。矛杆约1米6，锋刃约0.3米。校文革掌权两年多，有金属材料库，有工厂、有工人，这两种材料他们都有，制造了大批的长矛。1968年3月39日凌晨1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两派混住的31斋学生宿舍，公社武斗队所持的“兵器”就是长矛。《纪事》所述“镀锌”二字不确。329现场看到的和缴获的长矛，是管壁涂有桔红色防锈漆的铁管制成的。工宣队进校后，新北大公社上缴武器，930支长矛，涂有桔红色防锈漆，还上缴200根铁棒。《纪事》所述“1/2英寸”完全正确，这种管径（因为1英寸是8分），口语中称为“四分管”。居民家用水管、暖气管多为“四分管”或“六分管”。“四分管”内径15毫米、外径21.3毫米，重量1.25公斤/米。4吨“四分管”总长度3200米，不计算锯缝和“料头子”的损失，可以制造2000支长矛。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和“监管人员”，既用长矛，也用铁棒〔3〕，那么，耗用的钢管，数量大体上与《纪事》所记述，能碰得上。以上说的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方面的长矛。

新北大公社拥有大批长矛、铁棒，不是用来锻炼身体的，而是用作弹压、残害“阶级敌人”的：“老佛爷”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可以扩大到任何不同意见者的头上一——长矛、铁棒，一方面用来对付“井冈山兵团”；另一方面也用来对付“黑帮”、“牛鬼蛇神”等“专政对象”。郝斌《河水何曾洗是非》124页原文：“读过语录以后，监管学生或给我们派活儿，或宣布事项，有时候也会喊出某人给一顿拳脚。晚点名，才是我们人人都提心吊胆的一场，长达四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每次都要喊几个人站出队列，轻则训斥辱骂，什么叫师道，什么叫人格，那就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重则是拳脚之外另加棍棒。有一阵子，武斗用的长矛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个个低头弯腰，但见长矛在眼前晃动，不敢抬头去看拿着这种‘家伙’的人。我们已经是毫无抵抗力的一群，有几条木棒足以震慑，还犯得着用这种东西来对付我们吗？倒是另一种短兵器，让我们更怕：那是一米左右的自来水管，一头磨尖，可作为利器；另一头套有胶套，便于手握，也可作为钝器。商鸿逵先生有一次‘语录’背得不利索，越背越乱，又分辩了两句，就被这个‘家伙’当头一下。当时我和商先生各站队伍的一端，隔有七、八米远，‘当’的一声，能听出那是铁管敲在脑壳上发出来的声响。”〔2〕《河水何曾洗是非》128页原文：“这个时候正值酷暑，劳动量大增，新‘规矩’不断。我们被告知，熄灯之后、起床之前，监管人员要巡逻查夜。凡起夜上厕所的，见到监管巡逻者，要先行立定，再喊：‘报告——我是反革命分子×××，要去厕所。’得到准许，才能移步前行。否则——监管学生把手里的长矛高高举起——‘老子的这个家伙是不吃素的！’”〔3〕

后人须知，“老佛爷”是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对于聂元梓的共同称呼，“红太阳”在公开场合，口头上也“亦庄亦谐”，称呼聂元梓为“老佛爷”。

据笔者所知，“井冈山兵团”方面，在1968年3月29日凌晨1点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偷袭31斋学生宿舍的时候，一支长矛也没有；赤手空拳、无法自卫，上百人被刺伤、打伤、跳楼摔伤。31斋逃亡的学生和其他宿舍楼被驱赶的学生，进入32斋和37斋，有样学样，开始制作长矛。材料从哪儿来？就是停止供暖的暖气管——用手工钢锯截断暖气管，也焊上锋刃，制成长矛。《纪事》记述“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就是指的这个。

1968年3月29日之前，“井冈山兵团”没有独占的楼宇，28斋是空闲的越南留学生宿舍楼，“井冈山兵团总部”占用4间屋子、广播台占用4间屋子，整幢楼是不分派别、混合居住的。3月29日中午，“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的青年工人，清理住户，把不相干的人“礼送”出楼。于是，“井冈山兵团”独占了一座楼。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一台电焊机，安放在28斋楼内，开始焊接、制作长矛，“焊工小作坊”一时供不应求。制造出第一支长矛的时候，大家高兴莫名，好像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了。

关于329事件，俞小平说：“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的优势，一个强势的当权派向一个弱势的在野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外面是橙红色涂层，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1.9米，直径约2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25厘米长1厘米多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尖锐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有住房、有食堂，卡住部分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给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成建制地发放棉军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金属板材成批切取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公社，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各处收集来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面对不时冲击而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4〕

却说长矛的嬗变，源自实战。武术行里讲究“一寸长、一分强，一寸短、一分险”。临阵长矛对刺，还真是谁手中的兵器长，谁感觉安全、放心落胆。“井冈山兵团”本来就没有“制式”长矛的供应，自由散漫，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制作长矛，上阵的时候七长八短，被笑作“丐帮”。笔者见过的长矛，有不足2米长的，有2米半长的；还有干脆使用（玻璃钢）撑杆跳器械或使用长竹竿的。

近日看到原新北大公社成员王复兴在海外出版的《抢救记忆》记述，“3月20日左右的一天傍晚，晚饭后我从大饭厅往南校门由北向南的路上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紧凑的脚步声，回头一望，有两个手拿长矛、戴柳条帽的人在后面10米远正加紧脚步追我，似乎认识我。我感到不妙，撒腿就跑。两人立马紧跑追我，我突然感到后背如针刺一般被刺了一下，赶紧左拐跑进27楼，那两个人这才停止追逐。我跑到黄虹坚宿舍，述说了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在她那儿躲了半个小时。而后跑回38楼宿舍，王渊涛、陈双基正好在，我脱下外套、秋衣，让他们看我后背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在我后背脊椎（后胸）的正中部位，有个小红点，皮肤被刺破了一点点。”〔5〕

1968年3月20号，校文革成立了武斗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有“第二期学习班”编练的专业武斗队（钢一连最著名）、有长矛和柳条帽。彼时，“井冈山兵团”一支长矛也没有，一顶柳条帽也没有——不言自明，新北大公社“鸽派”王复兴受到“有个小红点”惊吓，如果不是编造的虚妄故事，那，绝非手无寸铁的“井冈山”学生所为。联想到329事

件，校文革一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突袭夜阑人静的31斋，他们的第一个伤员，竟然是被“自己人”铁棒打破脑袋、长矛刺伤后背的化学系62级（赤手空拳）学生田建行！说起来，够讽刺的。

“老佛爷”校文革一新北大公社发动武斗，实在是饮鸩止渴、作法自毙。

二、弹弓、弩石

北大“武装割据”时期，“井冈山兵团”占据学生宿舍毗邻的28、30、32、35、36、37六座楼，被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群团团围困。处于包围圈的内线，这六座楼房屋建筑的门窗、屋瓦、墙面以及遮挡门窗的家具损坏，都是外线包围者、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大弹弓轰击的。

《纪事》说“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不确，以偏为“全”了。实际情况是，这11座楼的相互“迎敌”面的绝大部分门窗被打碎。《纪事》说“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不确。少数的暖气片组被拆除，搬运到高处，当作守楼的“擂石”，在426实战中应用过。那一天，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武斗队，把36斋围困得水泄不通，在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两位哲学系“师尊”亲临现场指挥下，发起仰攻夺楼。守楼的井冈山学生，曾经从高处推下三两组暖气片，没有伤着人。每一组暖气片“擂石”落地，声响和卷起的烟尘之震撼，吓得成群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四散而逃。孙蓬一、高云鹏不得不鸣金退兵。

双方都有大弹弓。占据楼宇多的一方，射击口多，自然而然，弹弓就多。大弹弓的皮筋，是自行车内胎，或者是乳胶管（各四股、共为八股），一个壮汉气力不足以开满弓。皮兜是排球壳子剪开、制成。消耗品弹丸，是卵石或者破碎的红砖。

红砖双方都有，而卵石是新北大公社独家秘器。井冈山兵团被团团围困在六座楼里面，人员进出不得，没有卵石的来源。校文革有车队，公然一卡车、一卡车地从郊区河滩往学校运卵石。卡车司机如今还健在，不难问到当初装运卵石的情况。

还有损招——全校几百名“黑帮”、“牛鬼蛇神”都在校文革一新北大公社管制、残害之下——可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为他们装运卵石，或者直接强迫“黑帮”、“牛鬼蛇神”往学校肩背力扛卵石。郝斌《河水何曾洗是非》126页原文：“‘牛棚’里的监管人员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一个人，这是一种常规；可某个监管学生常常格外眷顾某个‘黑帮’，又成另一种‘常规’。这个聂玉海，可以说是周一良的对头冤家——‘单向的’对头冤家。一九六八年夏天，关在太平庄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被拉回北大，单独批斗，监管学生把这叫做‘单兵教练’。周一良先生是早早被拉回去的一个。押解他的，就是这个聂某人。出了太平庄，就是那段河滩路。聂玉海捡起鹅卵石，装进周先生的背包，一块又一块，直到装满，让周先生背到北大。当时校内分成两派，武斗正酣，这些石头放到用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正好做子弹。从太平庄到北大，走路、坐车近三个小时，步行的路程大约十公里。五十五岁的周先生背着这包石头不堪其苦，聂玉海则以此为乐。”〔6〕

大弹弓的威力，煞是了得：笔者知道“井冈山兵团”这边被弹弓打掉牙齿的、打开头颅的、打瞎眼睛、打断胳膊腿的，不下10人。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陶令煌，前额打破，一辈子留下大疤，像是三只眼。化学系62级学生张曼平，几乎打掉半数牙齿，才二十多岁，不得不装上满口假牙。透窗射入28斋的卵石，在水泥地板上弹起，打断了青年工人小李的胫骨（北京土话叫“迎面骨”），在北医三院住了四十天以后才伤愈。

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双方上缴武斗工具，“井冈山兵团”上缴了8副大弹弓（即使想藏也无处可藏）。而新北大公社在武斗四个月期间，动用20万红砖加上若干卡车的卵石，用大弹弓射击过数十吨弹丸、弩石，“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打烂井冈山楼房屋建筑那么多门窗、屋顶、墙面、双层床的“砦栅”及至家具，最后，象征性的1副弹弓也没上缴。

三、地道、天桥

前面说到，“井冈山兵团”六座楼偏居一隅，被新北大公社团团围住。“割据时期”开初，“井冈山兵团”楼和楼之间通道，用学生宿舍的上下双层木板床，在地面上竖立起来，用粗铁丝绞连，作为防御弹弓轰击的“砦栅”。但还是不安全，又向通道上面加设顶子——当然，也是木板床。不想，没几天，对方的大弹弓就把“砦栅”轰炸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甚至床腿都打断！前面提到的陶令煌，就是在通道“砦栅”里被弩石击中前额，成为三只眼的“二郎神”。抵御大弹弓，“砦栅”也不够安全。

路还是要走呀，怎么办？就有“现代愚公”想出挖地道的主意。看电影“地道战”或参观“焦庄户地道”可能觉得挺有趣、神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地道在地面以下，它是固定的，不能移动，完全是防御型设施。坦克车才是进攻型的。

《纪事》说聂元梓、孙蓬一挖了地道，不对。太平天国“天京”被围，“长毛”城防坚固，曾国荃挖地道，地道作业加上巨量炸药，轰塌城墙，攻进“天京”，纵兵烧杀奸淫大掠。1968年329事件，新北大公社夜袭攻占31斋，古今一体，也是纵兵大掠。31斋是男生宿舍楼，算是聂孙心目中的战略要冲，必欲夺之而后快。井冈山男生都逃命去了，攻占31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勇士们尽情劫掠，不负此夜力战之劳。

聂元梓、孙蓬一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尽占武力优势，士气旺盛，大力实施“武统燕园天下”，聂孙怎么会挖地道呢？地道是“井冈山”挖的，《纪事》记述为聂元梓、孙蓬一挖地道，张冠李戴了。

《纪事》说的几条地道，都是“井冈山兵团”割据区的楼与楼之间交通孔道。《纪事》说的地道尺寸规制符合实际。记得我们化学系62级同学耿天彭有诗句“地道行军戈相拨”，就是说地道里两个人对面行走，要“相拨”一下。见到有网络文字说，“井冈山兵团”地道里边没有照明设施，靠蜡烛照亮儿，非也。有临时拉线照明，是最简陋的白炽灯泡，地道里，摸黑是走不了路的。临时拉电线，则可能来自《纪事》所说的“灯光设备均被拆除”。《纪事》的“均”字用得恰当，“均”被拆除，莫非这几座楼里的“井冈山”学生一直摸黑过了四个月的暗夜？实际上，每当校文革不时地给“井冈山”停电，这几座楼里的人，不得不“烛光晚会”。不停电的时候，还是有电灯照明、电炉“炊事”的。

“井冈山兵团”挖地道，纯属迫不得已——地面通道“砦栅”不能保障行人安全，只好转入地下。何况，挖地道是一桩苦活儿，笔者略有体会。挖地道是轮班作业，地下的原始黄土层，细细的，不含砂砾，潮而不粘，刨挖并不很费劲。每个人干不了很大工夫，因为没有换气通风，地下十分憋闷湿热。37—36斋地道将近挖通的时候，笔者当班掘进。技术物理系62级女生傅华下来“视察”，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就是缺空气的缘故。她走不大工夫，笔者清楚地听见对面刨土的声音，心想，再坚持一会儿，多挖几铁锹…。忽然，通了，碗口大一个洞，迎面的凉风呼呼地冲过来，痛快透了——可以大口地呼吸清凉的空气了。这是第一条地道挖通的情形。

地道的最后命运，是自行坍塌。挖地道的时候，没有加设坑木支撑，只是用铁锹把地道顶部铲成半圆形的拱券。地下土壤本来就有潮气，工宣队进校，季节入秋，雨水频仍，首先是32斋至35斋之间的地道，自行塌方，地面凹陷1米多。好在地下除了照明线和灯泡，别的什么也没有，塌方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事故。

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困境的“井冈山兵团”，在28斋和30斋之间，架设了“过楼天桥”，在当年，大概算得上北京的“首创”。笔者推想，28斋和30斋之间的沥青路面走汽车、承重，不敢挖地道从地下穿过沥青路，怕塌陷，故而架设天桥代替地道。

28斋和31斋外形一样，两座楼好像是一张图纸下来的，都是南北70余米的主体，两端各加30余米的短横。天桥是从28斋的工字型楼南短横的西端面，接到东西走向、一字型30斋的东端面，悬空担在两楼4层的水泥地面上。至于天桥的建设，笔者住在37斋，竟然一无所知，而且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天桥。后来笔者步测，28斋南横楼西墙，到30斋东墙，22步。就是说，天桥空中跨度15米有零，离开地面的高度将近10米。

俞小平说：“我曾在天桥上多次穿行于28楼和30楼。有人很狡猾地（在天桥护栏上）贴了伟大领袖像，新北大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下攻击毛主席像的“罪行”。”〔7〕

近年，笔者见到同学发表这张图片和建造天桥的详明经过，不由小诗一叹。架设天桥用的木料，的确确实是来自《纪事》所说房屋建筑“35、36楼的屋架风撑”。

四、棉衣、毛巾

《纪事》说“损失毛巾500条，棉衣600件。”

这个账简单明了，直接算在聂元梓一校文革一新北大公社头上就是。329事件中，笔者和众多“井冈山”学生目睹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着装——黄色军棉袄、左臂扎白毛巾。4个月的武斗期间（3月29日到7月28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没变。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紧锣密鼓进行，笔者被押解、拎着马扎，到学三食堂，“参加”过一次化学系批斗“反革命分子”齐菊生的全系大会。阵阵轰雷般的口号声中，凶残地扭齐菊生胳膊、揪齐菊生头发、踢他膝弯迫其下跪、跳起来打他脑袋的同班同学蒋其宝、倪永康，还穿着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制式”黄色军棉袄。

1968年还是“票证供应”年代，北京居民每人每年发给十六尺布票，搭上棉花票，可以购买或者制作一件棉衣。新北大公社成员参加武斗队，马上得到“里外三新”的黄色军棉袄，不无小补，至于是不是被旁人讥讽为“黄马褂”，那就顾不得了。

本文引用的《纪事》中这段文字，只记述了北大武斗中房产部门的物质损失。更大的损失还有无辜受难者——殷文杰、温家驹、刘玮的生命，还有数百名受伤者，以及留存两派群众心灵的创伤。时间过了半个世纪，这些创伤还没有抚平。武斗的发动者对这些事实，仍在掩耳盗铃，甚至企图把责任推到他人头上，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反思。

注释：

- 1,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 2008年4月第二版, 969页。注:1967年3月有误,应为1968年3月。
- 2,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 124页。
- 3,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 128页。
- 4,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丛璋等人主编《燕园风云录·四》, 2016年8月, 80页。
- 5, 王复兴:《抢救记忆》, (美国)南方出版社, 2016年9月, 144页。
- 6,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 126页。
- 7,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丛璋等人主编《燕园风云录·四》, 2016年8月, 86页。

~~~~~

### 【亲历者说】

一位老红卫兵回忆文革砸全聚德

· 金 汕 ·

这几年有人想让阶级斗争的浪潮重新席卷中国。由于这个陈词滥调早已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加上阶级斗争名声太臭很快就偃旗息鼓。从这一点来说,还不如他们的老师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执着,他们一直坚持中国就应该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的徒弟却蔫儿了。

我和一些同仁一直在搜集“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大事小事都要搜集。最近好友周果谈及他在写作《当代北京广告史话》时采访过当年一位老红卫兵——砸全聚德的参与者,周果听后说,当时他才三四岁,听老红卫兵一讲也感到触目惊心。周果当时录了音,准备写进书里。老红卫兵声音有些苍老,60多岁的人就像70多岁的声音……

“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透露我的名字,第二不许公开我的声音,第三您得给我200元采访费,我下岗多年,就算给点喝酒的零花儿钱。……没问题,没问题,除去200元我还请您喝酒(周果的声音)“我是老高三的,记得上初中就开始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理论了,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特别希望有机会走上战场消灭帝修反,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您别乐,那时候就是那么宣传的,说全世界除去社会主义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都憋急了,就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机会终于来了,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横空出世,老人家接见,大家都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喊着‘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走上街头。除了在本校造反以外,还冲向社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谁是阶级敌人?不是法律说了算,我们说谁是谁就是。那些早就被吓破胆的地富反坏右成了我们显示阶级斗争的靶子。‘8·18’以后被打死的、吓死自杀的确实很多,最残酷的大兴一个公社杀了几十口子所谓地富和他们的子孙,最小的才几个月。我们也知道有好几起红卫兵用开水浇死活人的。由于我父亲是老工人,根红苗正所以也是红卫兵。但父亲有时也说,你别太过了,其实

资本家也没有报纸上说得那么坏，差不多得了，别打人家。现在想起来受过民国教育的人比喝狼奶长大的强。所以我只是砸抢，真没打过人。

“我也要阶级斗争啊，那玩意儿最时髦啊！‘破四旧’最首当其冲的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牌匾、字号、幌子、对联、字画及各种封建书刊。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首先在东城区各个街道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红卫兵告示，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

“1966年8月19日晚，北京二中、北京十五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六十三中的红卫兵聚集在北京前门大街已有百年历史的全聚德烤鸭店，声称全聚德烤鸭店是封资修的招牌，不能用了，我们已经做了一块新的招牌，必须换上。烤鸭店经理说我们不是私营企业，早就公私合营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烤鸭店。我们质问道：既然是社会主义烤鸭店，为什么还用‘全聚德’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牌子？烤鸭店经理无言以答。全聚德的部分职工支持红卫兵的立场，烤鸭店经理只得答应换牌子，让职工去把老牌匾摘下来送进仓库，换上红卫兵的新店名牌匾。我们斥责那个经理：你还想把封资修的牌子留起来吗？经理回答：总要有个地方收起来吧。红卫兵小将质问：收起来？收起来你还想重新挂吗？

“不等烤鸭店经理回答，我们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已经抄起家伙，将门口已经悬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砸了个稀巴烂。我们红卫兵还觉得不过瘾，冲上去又是一顿踩踏。接着红卫兵和店里的职工将写着‘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大木牌悬挂在大门正上方。换了牌匾还要换思想，红卫兵小将当即组织全聚德烤鸭店的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文件，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压迫的象征，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砸毁这个招牌就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残余，也是扫除资本家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

“我们一番话，烤鸭店的职工提高了认识，协助红卫兵将全聚德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的旧社会遗留下来字画、书法、幌子、店规全部毁掉，店员们从新华书店买回100幅毛主席画像，连夜在餐厅、楼道、橱窗、宿舍里张贴。周总理曾宴请过外宾的外事餐厅，原来挂着一幅画着北京填鸭的大型壁画，不是解放前的，是六十年代画的，店员问红卫兵换不换，红卫兵回答当然换了。于是一幅巨型的毛主席语录替代了这幅壁画，语录上的文字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统统都会被消灭！’

“8月20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改头换面的‘革命’烤鸭店诞生，不仅牌匾换了，门口还挂上了一块新招牌：‘欢迎工农兵进餐’。服务员也都穿上了红卫兵的服装，带着袖标。原来几个中学的红卫兵破完四旧还是不放心，就留下了10个人常驻在烤鸭店里，担任‘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烤鸭店有红卫兵把守，进来的食客先问你什么出身，食客们都被吓跑了。这一天几乎没有人来吃烤鸭，路过的行人也不敢停留，害怕被红卫兵抓进去审问。

全聚德烤鸭店改名号仅仅是破四旧运动的一小朵浪花，当时北京所有老字号、老商铺、老街道、老医院、老楼房都被改了名字。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协和医院，原来是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医院，解放后划归国有，但牌子还是老牌子。红卫兵将其改名为“反帝医院”，老牌子被当众销毁。琉璃厂专卖中国字画的著名商铺“荣宝斋”，红卫兵将其命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三门市部”。在销售艺术珍品的玻璃橱窗上，红卫兵还贴上了一个告示：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佬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在“荣宝斋”的大门门框上，红卫兵还贴上一幅对联：为人民坚决创立新；为革命彻底砸烂旧。

这位老红卫兵说：那时候真像吃了迷魂药，现在想起来都羞愧无比，怎么能像畜生用打砸抢取乐那？几十年过去老同学见面，当过红卫兵的都怕提自己这段经历……

□ 原载作者新浪博客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三）

• 王复兴 •

（上接 z k 1 6 1 2 b，第二章、1 9 6 6 年：文革爆发）

6、工作组进校，开展反右，矛头向下

1 9 6 6 年 6 月 3 日，中央电台广播、人民日报发布：北京新市委决定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以河北省文教书记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正式进驻北大。实际上工作组从 6 月 1 日已开始陆续进驻北大。工作组成员主要是从海军航空兵部队及中央各机关、各部委调来。随后从 6 月 5 日到 6 月中旬，北京市各大专院校都进驻了工作组。

北大工作组领导运动的特点是：开展反右，矛头向下。所谓反右，矛头向下，主要指向三类人。一类是党政基层部（有点像农村四清整生产队干部）；一类是知识分子（出身不好或有一般历史问题的讲师、教授）；一类是学生（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张承先在 6 月 1 5 日全校动员大会上，说“北大是被资产阶级长期垄断、专政的一个反动堡垒”，运动要打击的主要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注 1 0）6 月 2 2、2 3 日，工作组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佩云。孔繁、张恩慈做了控诉发言。据 6 月 2 6 日工作组秘书组统计，在 6 月的 2 6 天之内，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斗人数已达 2 3 0 人，被戴高帽游街的有 1 0 7 人。（注 1 1）工作组集中看管、居住有问题的“黑帮”，所谓北大的“牛棚”起始于工作组时期。这个时期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 人，包括历史系三级教授汪篯、西语系副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以非正常死亡的时间密度而言，工作组在短短 5 0 多天内有 4 人非正常死亡，平均不到一个月死 2 人，远远超过后来的校文革和工军宣队。

6 月中，历史系学生搬回了 3 8 楼宿舍楼，我们班男生住三楼。

6 月中旬，我记得以下几件事：

一是历史系在工作组领导下，五年级批判反动学生二吴二达，其中两人姓吴，其一叫吴九龙；另两人姓名最后一个字是“达”，其一叫王明达。另外两人名字忘了。说他们犯了什么罪错不清楚，我们一年级没参加他们年级的活动。八月初工作组撤走后，二吴二达要求平反，但五年级很快就毕业分配走人了，此事不了了之。

二是工作组组织全系师生参加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邦之子）等三人的讲用会，讲他们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愿中途停止学业，下乡务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讲用会后，我和张文虎、徐森等同学议论道：胡德平这三个同学能做到这地步，真不简单，表明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很是敬佩。

三是每天看大字报，不时会碰上各省、市领导或国家领导人。一天傍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来到北大，有人认出他并高喊：欢迎曹荻秋来北大，立马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四面八方如万马奔腾，一片啪、啪、啪的跑步踏地声，三、四百人跑来，把曹荻秋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在里圈，与曹相距二、三米，看到曹很紧张，他可能没见过这阵势，似乎有点害怕。曹喊了几句口号：同学们好，向北大师生学习，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之类。然后匆匆在警卫员护卫下乘车离开北大，也没顾上看大字报。

四是，工作组刚进历史系时，就让各班选举三人领导小组，我们班选出的是高发元、张明华、我。这次选举没什么条条框框，很民主。俞政后来告诉我，他投了我一票。过了不久，不知为什么，在工作组主持下又重新选举，俞政不知内情，照样投了我一票。但开票宣布结果，我只得了三、四票（全班有25人），当然落选，高、张二人仍被选上。为什么重新选举？俞政认为就是为了把王复兴选下来。俞政怀疑工作组在第二次选举前曾向团员、革干、工、农子弟打过招呼，所以行动一致，都不投我的票。而俞政既不是团员也不是工农子弟，所以没人向他打招呼。俞政分析，工作组进系，肯定首先查阅了师生档案，因此才有这类事发生。此事给我造成了无形的压力。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种威胁，但又抓不住，说不明。

6月18日前，运动基本上风平浪静，运动仍按各系、科、级、班建制运行，全校活动极少。

7、“6·18”事件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众多学生脱离工作组的控制，自发地乱揪乱斗各系学术权威、党员干部的事件。我们班没人参与。我到了傍晚才听说白天很多系斗了“黑帮”，给“黑帮”戴了纸糊的高帽，脸上涂了黑墨，押着做“喷气式”批斗。听说历史系也有老师、干部挨斗。我看到38楼高台前贴了大字横标“斗鬼台”。晚饭后，工作组紧急召开了全校广播会议，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白天发生的乱揪乱斗现象，强调有坏人、反革命钻空子，捣乱、破坏。要求“以后批斗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后来获知，工作组上报给中央一个“九号简报”，汇报了6·18事件及工作组的处理方式，把“6·18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把此简报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国。

6月18日后，各系工作组要求师生认真讨论张承先的报告，每个人要讲述自己在18日那天的表现，讲自己都干了什么。我们班18日无人参加批斗活动，很快过关。有的系搞人人过关，人人自危，并揪出了个别有问题的“反动学生”。全校揪出了40多名“反动学生”，都控制在各系各班批判，没有搞全校性活动。工作组不允许乱斗黑帮，并不是不斗，而是要有领导地斗。据说工作组内部把所有师生排队，分为四类人，分为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手里掌握一个“有问题人名单”，组织他们集体劳动。各系被冲击的干部、教授（被群众称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多被工作组集中监管，集中住在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牛棚”里。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因被批斗和被大字报揭批，不甘受辱，于7月28日自杀。（校文革于1966年9月9日成立后，被工作组监管的干部、教授，包括陆平、彭佩云，经中央文革王任重批

准，被校文革接手监管。）工作组内控的第四类人（右派）名单中，各级党政干部521人中有119人属于第四类，占22%。（注12）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贴出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尔后，历史系胡德平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应当做保姆。”校园出现许多支持或反批评陈必陶、胡德平的大字报。我和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等人在38楼北墙贴出支持胡德平的大字报。

7月18日，工作组再次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对6·18事件突然变调，张承先讲话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批斗黑帮的大多数人是好的，只有少数坏分子捣乱”，“工作组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限制、束缚了群众手脚。”表示“欢迎群众给工作组提意见”。等等。

6月18日之后整一个月，在7月18日张承先为什么突然转弯、变调？当时听到传闻说“上面”批评他了，但详情不知。多年后看资料了解到：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而是藏在湖南的“山洞”（韶山滴水洞）里，琢磨打垮刘邓党系统的战略、策略。他当时和北京方面有何联系，尚无信息解密。但陈伯达在京则于7月13日在常委汇报会上对派工作组提出了非议。接着，在7月17日，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批评了张承先，说6·18是万人大革命，只有极少数坏人捣乱。以上是张承先7·18转弯、变调的背景。毛泽东是7月18日返京，23日前听取对工作组不同意见的汇报，并未对工作组表态否定。直到7月24日、25日在中央汇报会上，毛明确表态说工作组把运动搞的“冷冷清清”，“阻碍了运动发展”，应“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一反他最初同意派工作组的决定，把派工作组压制文化革命做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的一条粗辫子、错误路线罪状，抓在了手里。

7月19日，聂元梓在哲学系对师生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0日开始，校内保、反工作组两派展开大辩论，针锋相对两种意见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满校园。高干子弟李丹林（李雪峰之女）、贺晓明（贺龙之女）、吕宏（吕东之女）、赵惠生（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父亲是海军司令部高级将领）等6人，贴出《爱护工作组，保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基调是保护工作组是保护党的领导。大字报贴在大饭厅东墙。他们的大字报给人一种压力，似乎反工作组有可能滑向反党。我虽然与赵惠生是四中校友，私人关系挺不错，但对他们这种跨系的高干子弟联合签名并贴在大饭厅入口处十分醒目的位置，觉得他们有种居高临下指导运动的味道，对此挺反感，而且不同意他们保工作组的态度。于是我们班经我提议，大家讨论，决定起草一份与李丹林等人大字报针锋相对、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大字报由几人分段执笔，我写了一个小标题下的内容。大字报主题是批判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签名时，罗志刚要求签第一个，我、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杨桂香、钱凤娟、虞赛莲、郑维生、李延龄等人都签了名。没找干部子弟张明华签，因知道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大字报抄好后，贴到李丹林等人大字报的下方。当时有许多人围观、议论这两份一上一下、对立的大字报。过了一天，罗志刚有些害怕，对我嘀咕：会不会围攻他？我对徐森、张文虎说，罗志刚是又要出头，又怕枪打出头鸟。当时，对工作组的反与保，会斗出个什么结果，谁心里也没谱。那时我内心深处也曾闪过二吴二达被打成反动学生之事以及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之事。告诫自己绝不可在文革中犯错误，成为右派、反动学生。这一阴影不时会不自觉地脑中冒出来，但我不会对任何人讲。而后我又会不断激励自己，应抛开一切顾虑，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一切，认为正确的观点就坚持，就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批判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的，一定要顶住，经受住考验。

8、中央文革到北大，工作组被撤销

7月22日、23日二天，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调查，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接见了聂元梓。这消息马上传遍了燕园，人心躁动。

7月25日，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穆欣，到北大再次召开座谈会。尔后当晚在五四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江青主持会议，她首先逐一介绍了中央文革每个成员。然后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师生轮番上台发言。每种意见表达完后，都有几千个不同意见的群众对所支持的发言鼓掌、欢呼、呐喊：“对！”、“好！”。两派的声浪不相伯仲，气氛激烈。

第二天26日晚，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再次到北大五四操场，继续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李雪峰、吴德、张承先也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主持大会。批评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轮流上台发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文系61级学生李扬扬代表31名高干子弟的发言。31名高干弟中包括贺晓明（贺龙女儿）、李丹林（李雪峰女儿）、张少华（毛泽东儿媳即后来人称的绍华）、张少林（张少华之妹），赵惠生（父亲是海军高级将领）、雷渝平（雷英夫女儿）等。李扬扬在发言中强调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是“延安”，不是“西安”。李扬扬发言的最后，用很长时间一个一个念了31名高干子女的名字。似乎人名比内容重要。但另一派群众根本不买这批高干子弟的帐，他们批评工作组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发言时，说有人把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去了。说她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人迫害（指文革前历史系下乡四清时郝斌老师曾批评过李讷，李讷是历史系65届毕业生。江青讲话后郝斌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江青还说北大中文系的张少华是个骗子（学生、江青儿媳），她母亲张文秋很坏。（江青点名骂张少华，应与她是31名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有关。事关毛泽东撤工作组的重大决策，因此江青在大会上表示与张少华划清界限，表示张少华保工作组不能代表毛家。笔者认为不能把江的发言简单地理解为江青仅仅是在唠叨家庭矛盾。）康生讲话中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说6月1日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主席指示中央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从而使聂元梓等七同志获得了解放，他也获得了解放。陈伯达讲话中说到，6.18是革命事件。赞成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江青最后再次讲话，建议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起来闹革命，要聂元梓负责筹建。

7月28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大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讲话，提到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7月30日至8月3日，北大召开三次全校批判大会，批判工作组。

8月4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再次到北大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江青首先讲话，代表毛主席向北大革命师生致敬。康生讲话中，对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表示祝贺，正式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康生说，毛主席讲“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会后同学们纷纷议论，认为毛主席把北大文革的爆发比做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伟大创举，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创立、选举革命人民的新政权的创举。这是开创了国际共运的新道路。这是伟大领袖号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用直接民主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同学们为能亲身参加这一伟大革命而感到生逢其时，太难得，太荣幸了。这是那时本人及周围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和心态。多年后得知，康生传达的关于毛泽东赞誉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北京公社宣言”，是毛泽东在同一天（8月4日）早一些时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上讲的，毛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注13）毛的话，康生当天晚上就拿到北大群众大会上讲了。

随后在9月初，校系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纷纷成立。北大文革主任是聂元梓。校文革委员由各系选举推出，有：邓朴方、王茂湘、吴维能（笔者所在的历史系）、孔繁、杨克明、姜同光、徐运朴、侯汉青等人。孔繁任副主任。我们历史系的文革委员会主任是吴维能，副主任是魏杞文老师和三年级学生胡德平（胡耀帮之子）。历史系选举时，三年级学生推荐胡德平时说，胡德平“根红苗正”，“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我们班全体投票选举了魏杞文、胡德平。

据1966年9月13日《新北大》校刊记载，1966年9月9日全校进行投票选举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全校有选举权的人是13,836人，因外出串联等原因，实际参加投票的是9,609人。（投票人占有选举权人数的69.4%）“选举结果：42位当选为校文革委员会委员。校文革成立后，发了‘向毛主席致敬电’，称北大‘第一次实行了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这个‘第一次’应是北大百年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但这种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方式并没在全市、全国推开。‘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权力机构的形式，在北京，在全国，成了罕见现象。究其原因，毛泽东、中央文革根本无意推广这种全民投票的选举方式。北大师生也不懂这种选举的意义，因此后来的‘井’、‘红’以及再后来的‘井冈山兵团’，要推翻校文革，无人提出重新投票选举或全校来全民公决，支持校文革的一派也无人用当初‘校文革’是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合法性，来批评要‘砸烂校文革’的反对派。孔繁、杨克明、徐运朴、侯汉青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想着需要征求选民意见。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实行的‘大民主’，是个临时措施，是权力斗争的手段，与现代‘宪政民主’完全无关。不过在1966年9月，在北京大学，确实曾发生过这么一次：一人一票、全民直接选举权力机构的实践。

9、对文革初期“五十天”的反思与认识

文革后，国内官方宣传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起阶段以工作组领导运动是一条务实的马列主义路线。有的文章认为是一条抵制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正确路线。近年海内外有许多人认为，那“五十”天，是刘、邓以57年反右经验为基础，展开的一场新时期的大规模反右斗争。刘少奇、邓小平既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人民的迫害者。我赞同后一种观点。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注14）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注15）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已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

过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1957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清华的蒯大富6月21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小字报。王光美指蒯“要夺权”，薄一波指示“要反击”。工作组组织师生在校园游行，高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整了不少学生。我们班徐森和清华汲鹏是北京13中同班校友，我们去清华看汲鹏，听他说工作组整了很多，各系都抓了一些反工作组的反动学生，他和蒯大富一样，被打成反党分子、反动学生。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比北大工作组整人厉害得多。北大揪出40多个“反动学生”，清华揪出了800多个“反动学生”。因此清华在后来批资反路线时反弹的力度比北大就大得多。8月初周恩来到清华为蒯大富平了反。平反后的蒯派后来组成清华井冈山造反团，矛头自然地直接指向了王光美、刘少奇。毛刘之争在清华表现的更明显。毛泽东一反1957年之道而行之，利用了反迫害，要自由的群众，冲击刘邓控制的党务系统，以夺回他自己所说的已“大权旁落”之大权。毛泽东曾把自己的斗争策略总结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他对这一权术的运用，在文革中屡见不鲜，十分纯熟。

清华运动翻转，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央的斗争与底层社会的矛盾斗争之间，相互交织与互动。

1957年反右后，人们普遍不敢给党的领导提意见，谁给基层领导提了尖锐一点的意见谁就是反党、右派。这成为绝大多数党团干部的定式思维，成为文革初期保皇大军形成的思想根源。但在1966年8月事情发生了变化，8月《红旗》11期刊文，透露《人民日报》6月2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毛泽东加了一条注：“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而后《人民日报》也发文宣传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这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造反有理”的根据。“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这一党中央的新的提法，对1966年8月以后造反派抛弃57年反右思维，形成造反大潮，影响巨大。

据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之前三天，刘少奇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一张大字报引发的北大学生运动（北大许多师生支聂等人的大字报，贴大字批判陆平党委，并有游行示威。），此次讨论学生运动的中央会议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戚本禹披露：“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附和邓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周恩来则袒护学生说：“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注16）这个会议的日期5月29日，正是风暴乍起，尚未燎原之时，此时刘、邓已确定要在学生中抓右派，因此后来工作组才会大抓“游鱼”，开展新时期的反右派斗争。工作组的路线被毛泽东批为“资反路路线”而被否定，形成了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但到了文革之后的1983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终于被邓小平“指导”的法庭，判为“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右派、反革命，“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成为刑事罪犯。邓小平于1966年5月29日的意见，事隔十六年之后，终于得到实施。

10、一次全班会议

8月上旬，工作组撤走后不久，以班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建制维持了一个很短段时间。有一天开班会，地点在38楼下北侧院子里，全班同学围了一圈，席地而坐。开会时，班长高

发元（贫下中农出身）突然说，“大家不知道，王复兴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父亲是右派。王复兴要在运动中好好改造思想。”我一下“懵”了，什么话也说不出。会后心情很坏，很苦闷。心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可为什么我怎么努力都不行呢？难道父亲有问题，我就不能革命吗？我七岁从美国回来，就有特务嫌疑吗？心里不服气，认为他这是“左派幼稚病”、“关门主义”，不许别人革命，是错误的。我不能认同、屈服于你们这种做法。我打定主意，要甩开家庭包袱，紧跟毛主席，在文革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做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自己的青春价值。路是自己走的，谁都甭想阻挡我。俞政后来对我分析此事，对我讲，高发元之所以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应是工作组在校时向他透露的。工作组进驻北大期间，查档案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管治人民的基本作业。工作组在校时班里第二次选举的黑箱作业就是这么回事。当时高发元尚未摆脱工作组影响。后来在1970年2月毕业前的一次班会上，高发元向我道歉，说他那次发言不对。毕业后，他又曾写信给我，再次向我道歉。我一直认为高发元是个很正直的人。当时他那样说也不能全怪他。当时毛泽东支持的中学第一批红卫兵（人们称其为“老兵”或“主义兵”），已在全市各处张贴、宣扬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部分学生中影响很大，形成一股思潮。当时由许多高干子弟所鼓动，以“阶级分析”、“阶级路线”为名，行“人分等级”、“贵贱有别”之实。

8月中旬，北大几个系出现了首批大学红卫兵。历史系一、二年级以赵惠生、徐博东、张明华等几个高子弟为骨干，吸收一批工农子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班大部分人没份参加。历史系“主义兵”成立后，在五四操场举行过批斗陆平大会，去过团中央造反贴大字报。

那段时间，在中央文革号召下，大串联开始兴起，学生坐火车免费。我也准备外出串联。“主义兵”的张某听到我的动静后，一天突然带着八、九个历史系一年级的“主义兵”，进了我住的宿舍房间，“勒令”我“不许出去串联”。同班室友王渊涛（出身下中农）正好推门进屋，一看屋里坐满“主义兵”就愣住了，想退回去，张某对他说“你也坐下听听吧。”意思是让他受教育。张问我“我们红卫兵要去抄你父亲的家，你什么态度？”我回答“可以，我同意，现在就可以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张无话可说。然后张某领着“主义兵”高呼了几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当时社会及校园内出现过标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被禁止串联后，陷入了更深的苦恼之中。感到自己快成了专政对象了，失去了大串联的人身自由。但深入思量，你们主义兵凭什么“勒令”呀？你们算是什么呀？你们这样做是“唯我独左”，不许别人革命，难道你们天生高人一等？王渊涛目睹此事，对张某、主义兵十分气愤，对我讲，“他们怎么这样翻脸不认人，难道他们是‘自来红’？”下中农出身的王渊涛为人纯朴、善良、富正义感，此后与我成为终生好友。徐森听说此事后，也十分气愤，表示不去外地串联了，在学校里陪着我。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和慰藉。

1 1、恐怖的“红八月”

8月的北京城，各中学红卫兵（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蓬勃兴起。这是在中学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海淀有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航附中、矿院附中、101中、八一学校等；在城区有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25中、三中等。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等口号的号召下，他们在校内造校长、老师的反，并“杀”向社会。当时天天听到各种传闻：中学红卫兵穿着旧军装，在市区到处搜寻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分子，抄家，遣返地、富回乡，用铜头皮带抽打“坏人”，打死了许多地主、地主婆，等等。8月5日，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打死。八中副校长温寒江被批斗时被打的满身是血。八中有第一审讯室、第二审讯室，在八中

上初中的弟弟王复明亲眼看见在私设的刑讯室里，红卫兵对被视作黑帮的干部、教师拳打脚踢，用开水往身上浇。六中的审讯室里用人血在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几十年后笔者从资料得知，到1966年8月底止，在北京各城区被打死的人有1000多人。这是根据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的9号简报。笔者看到的另一资料的具体数字是1772人，此数字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档案。文革后《北京日报》曾发表过这一在“红八月”被打死人的数字。）

8月至9月，北京还曾掀起一个“遣返运动”，红卫兵要把北京市的黑五类及其家属赶出北京，遣返乡下。两个月内有8万至10万人被遣返。此“遣返运动”起源于“西纠”的《第四号通令》，《通令》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当时北京火车站每天有几千个红卫兵（老兵），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拿铜头皮带或木棍，搜身，打人，驱赶黑六类人群进火车站。有的被遣返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有的回了原籍，没房子没饭吃而饿死；有的不被原籍农村生产队接受又赶回了北京。我的北大校友马西沙，他的父亲马旭是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马西沙多年后告诉我，他的祖父在49年前是密云的大地主，土改时被扫地出门，搬到北京市内住。父亲马旭做为党的干部在49年后和祖父、祖母断绝了关系。红八月时，祖父、祖母被遣返密云农村，而后两位老人被红卫兵打死了。马西沙对父亲没能保护爷爷、奶奶，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对父亲持批评态度，并告诉我“抗战时期父亲去延安，爷爷给了父亲一口袋银元上路。可是49年后父亲却不能保护住爷爷。”

四中校友孔丹在文革后回忆“西纠”，强调“西纠”为维护社会秩序，阻止“老兵”乱斗起了正面作用。这与北京市民的记忆，与众多当年中学生的记忆出入极大。仅《第四号通令》的恶劣影响及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西纠”、“老兵”私设的刑讯室打人，孔丹就不能回避。红卫兵（老兵）在红八月的这些行动，当时得到了《人民日报》的公开赞扬，8月29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时，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的红卫兵袖章。并在问她的名字时针对“彬”字，对她说“要武嘛。”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导。毛泽东的这句“要武嘛”与首都红卫兵的各种作为的信息迅速传遍全国，对全国在文革初期的乱斗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8月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有人大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妹妹王丹娜，她骑自行车跑了几十里地来找我，神色紧张。我赶紧拉着她到楼道口，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家里附近邻居有的是地富，被红卫兵打死了。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母亲脾气急，如果跟人家顶嘴、吵架，那非挨打不可，弄不好会被打死。问我怎么办？我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告诉她，回家嘱咐妈妈千万不能和红卫兵吵架。妹妹回家后，把家里的老相片全烧了，把老唱片砸碎了。（几十年后父亲向我抱怨，写信给我说，文革时自家的红卫兵在家里造反，把老照片都放火烧了，真可惜。我回信告诉父亲，妹妹那时没资格当红卫兵，她不是造反，而是恐惧，是为着自我保护，而干了烧相片的傻事。）后来真有一队红卫兵来到我家，来者说是西四中学的红卫兵，声言听说这个大院是地主资本家，要抄家。幸亏姐姐拿出祖父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证明，并告之我们家不是地主资本家，让红卫兵去问派出所。他们去了派出所，派出所说：这家不是地主资本家。因此免了抄家。

八月底的一天，清华好友、自控系三年级的于宁（四中校友、北京游泳队队友）来北大找我，他说“现在是红色恐怖”，说前两天有许多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及其他中学的红卫兵来清华撕大字报（被撕的主要是揭批王光美、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高喊并张贴大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还殴打了

“黑帮分子”（一部分清华的党政干部和教师）。据说这些中学红卫兵得到当时清华文革筹委会头头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的支持。工作组撤走后，蒯派和筹委会斗的挺厉害。

大约是在8月底的一天，我去于宁家。他家在北京市内北海后门东边、什刹海对面的米粮库胡同。我正赶上他们家刚被抄家，看到了他们家刚被抄后的惨景。满屋碎纸、一片狼藉。于宁母亲一脸无奈地对我说，“家被抄过了，四旧扫掉了，没包袱了，也就轻松了。文化革命嘛。”于宁告诉我，这事赖他在邮电学院的妹味，她跟邮电学院的红卫兵闹的挺僵，结果人家来抄了他们家。他们家的房主是于宁祖父，他祖父是原张学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父亲是知识分子。于宁家我常去，是三套四合院相连的一个大宅院。文革后期1975年四届人大后，邓小平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总参出面把米粮库的于宅大院要走了，给了于宁父亲位于西直门外展览馆路公寓楼里三套二房一厅单元房，外加四万元人民币。算是通过协议交换。此后那个大宅门成了邓宅。

8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两侧有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讷（毛泽东女儿、历史系65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很快在全校传开。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历史系尤甚。当时北大掀起了抄家风。在劳改的“牛棚”里，有许多党员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白天在校园下地、拔草，脖子上挂个“×××黑帮”的牌子，晚上集中到“牛棚”睡觉。那时每天从全市和外省市来北大参观、取经的群众达几万人，高峰时每日达七、八万人。有些人围观“黑帮”劳改时，喊口号、辱骂、甚至推打。这些对全市、全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时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华文化的象牙之塔，完全没有法制可言，暴民政治波及全国。那时有一篇毛着影响极大，即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北大人将其全文抄写成大字报贴在留学生宿舍楼对面的大字报苇席栏上。毛赞赏的“痞子文化”风行一时。我当时对这种不人道、不文明的事，很看不惯。心想，中央怎么还不下文，制止这些不符合政策的事呢？这些想法，只会想，不敢说。能做的只是不沾手，不参加。

在红八月发生的最严重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发生在大兴。当时只听到一点传闻，三十多年之后才逐渐在海外了解到更多详情。66年8月时曾有人把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汇报到毛泽东处，有人提议发出制止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但毛泽东不同意，指示暂时“不要干涉”。公安部长谢富治指示，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打人，并对公安人员讲“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8月下旬，北京市内出现了红卫兵殴打、屠杀“黑五类”的高潮。高潮的波峰出现在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老的80多岁，最小仅是38天的婴儿。有22户家庭被杀绝。屠杀对象是土改时的地主富农、地富子女、地富亲属。杀人方式有棍棒殴打，铡刀铡，用绳子勒死。指挥屠杀者是部分县、公社、大队三级党、团干部。事态严重恶化后，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下令停止屠杀。9月1日，大兴县委、县政府紧急奔赴各公社、大队传达中央禁止屠杀指示，屠杀风停止。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北京市内的杀人风亦停止。

现今，我对大兴事件的反思：在文革中，不仅仅是党的干部受到迫害，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普通民众也受到迫害，而且受迫害的普通民众，人数之多、遭遇之惨烈，更加严重。但文革后对普通民众所遭受迫害之事的揭露、控诉的文章少之又少。至今像大兴县这种典型的

反人类罪尚未得到彻底清算。文革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并不仅仅是大兴事件。广西的杀人吃人事件、湖南道县屠杀事件、海南岛68年8月屠杀事件、各地发生的军队镇反开枪事件，等等，这些大规模屠杀事件、严重刑事案件，那一件得到了全面披露和清算？文革刚结束，邓小平急急忙忙把中央政争当着刑事案件处理，把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当做刑事案件解决，审判了听命于毛泽东的江青、林彪集团、审判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同时在按刑法审判中，却完全回避、保护下达“最高指示”的主犯。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在立案、审讯、定罪、量刑、判刑上，要听从邓小平、彭真几个人的指示，没有独立性。邓小平钦定的那个审判，完全是歪曲、破坏法制。与此同时，他们无视文革中大规模杀人的刑事案件，不调查，不立案，不审讯，不判刑，不清算。不该审判的审，该审判的不审。如果审判、清算了文革中那些大规模的屠杀罪、反人类罪，便不可能出现1989年的“六四”大规模屠杀事件。但对邓小平而言，对以前的那些该清算的不清算，与其后来“六四”中的所做所为倒是颇为一致的。

8月时，历史系有二十几个干部、教师被关入“牛棚”劳改。到9月时，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在昌平太平庄（原历史系半工半读地址）设了劳改营，把关在燕园的向达、杨人鞭、邓广铭、邵循正、商鸿逵、周一良、宿白、闫文儒、吴代封、郝斌、田余庆、徐华民等23人送至此处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开始分批返校，最后一批5人迟至67年3月返校。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当时还有两名患神经衰弱病的学生也一同到此处修养。按郝斌回忆，比起在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他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近年看资料才知道，当年在太平庄监管他们的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高海林，他对被监管的教师、干部态度很凶恶，经常进行训斥。近年郝斌（历史系教师、文革后曾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曾着文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周一良（历史系教授、文革后期“梁效”成员、文革之后曾任历史系主任）则着文表示“大家都信过神”，其意对高海林之事，应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1998年年初，北大百年校庆将至时，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30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到北大请时任历史系系主任的周一良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到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
“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注17）

时隔30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之大，可见当年高对他伤害之深。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隔了半年，1998年6月，时年85岁、因患帕金森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烦人代劳，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还想说的话》（注18）。他先把前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紧跟着，对高海林的态度，周先生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他接着又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注19）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并且做了回应。1999年4月，周先生曾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采访者顺带提及“喊话”一事的时候，周先生对他们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注20）

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张口就说：“这个人左得很。”他与我的印象相同。但在我的印象中，高海林在文革中也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亮点。1967年7、8月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高潮时，高海林曾以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名义前后贴出两篇大字报：一论、再论《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虽然该大字报喜欢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类夸张、绝对化的概念，但他当时在全国反军狂潮的形势下，确有一种反潮流，坚决捍卫长城的气概，旗帜很鲜明。周一良老师说当年师生们“同样信过神，上当受骗。”这也应是由衷之言。周一良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成员，成为“四人帮”的御笔，应是他痛悔之事。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

12、8月经历的几件大事

8月1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北大学生得知，聂元梓、杨克明做为革命师生特邀代表列席了会议。在会议后发表的公告中，我注意到林彪排名上升至第二位，陶铸排名上升至第四位，刘少奇排名下降。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百万红卫兵。8月上旬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联后，北大学生宿舍、体育馆挤满了外地学生。8·18一大早，我们在校未出去串联的学生被组成临时纠察队，带领外地学生坐上大卡车奔赴天安门广场。我们学生纠察队与北京卫戍区战士一起负责维持序，我当时被安排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前的纠察线。大会开始后，当毛主席走到天安门城楼西侧向下招手时，我和几万人一起狂呼“毛主席万岁！”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革中穿上军装。我心想，主席穿了军装，这是表示要带领红卫兵进行新的长征，打个大的政治战役吧？另外，我注意到林彪站在毛主席一旁，周恩来站在另一旁，刘少奇站的位置离主席远了。对此我感到反常，但没敢多想。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检阅全国百万红卫兵。没有去外地串联的我，又一次做为北大学生临时纠察队，到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卫戍区战士一起维持秩序。这次天安门广场对人群的布局，与8·18明显不同。环绕广场一圈，由人墙组成了一条10米左右宽的车道，沿长安街向西，到大会堂向南拐，到纪念碑前向东拐直行到历史博物馆北拐直行回午门。我所在的警戒线位置，在西观礼台下靠南30米左右。我们被通知，毛主席将乘敞篷车检阅红卫兵。下午四点左右，一行几辆敞篷检阅车由天安门午门缓缓开出。当几辆敞篷车开到我正前方时，对面另一侧人墙（二层人，一层学生纠察队、一层卫戍区战士）突然被巨浪般的人潮冲破，毛主席的座驾被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我当时离主席的座驾约10米左右。我清晰地看到主席坐中间，左是林彪，右是贺龙（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尚未被打倒。）我心想：毛主席这是抓着枪杆子搞文革呀！主席座驾的后排站着两名军人，第一排除司机外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军人。当时毛、林、贺脸色严肃，极不高兴。五、六分钟后，从午门方向冲过来一字长蛇阵的近百名带着领章、帽徽的军人，他们各个身体健壮，臂力极大，每人用双臂向两侧拨开人群，大约仅用了20分钟左右时间，挤到检阅车旁。（眼见为实：这一支应对突发事件的队伍，既不是孔丹在口述回忆中所说的年稚瘦小的中学红卫兵“西纠”，也不是一司头头所说的大学红卫兵“一司临时纠察队”，而是类似特种兵的正规军人。）然后我看到，车队被士兵们推着，缓缓向午门撤走，周总理爬上了毛泽东所在检阅车的车头，弯腰站在车头向前俯身，双脚穿着一双锃亮的硬底黑皮鞋，后面有一战士双手搂着总理的腰以防滑

倒。我心中暗叫，小心！周指挥人群向两侧后退，并不时招呼人群“小心压脚！”一串检阅车缓缓撤回午门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毛主席等一行人出现在城门楼上，大会开始，时已近傍晚。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心想，周恩来真是：鞠躬尽瘁，忠心护驾。他对领袖无限忠心，但同时心中也总想着民众（怕滚动的车轮压到人群）。我时常想，这应是周恩来的特点，他有着忠君与忠于人民的两重性。记得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所有人一样，胸前也佩戴毛主席像章，但他所戴的像章较特别，是横的长方形，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并有个毛主席的小头像。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红卫兵，被检阅的红卫兵总数达到1200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话反说，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讲，他干了三件事闯了大祸，一件是支持了聂元梓大字报，一件是支持了红卫兵，一件是支持了大串联。毛泽东以此三件事，动员起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人们在想：主席要干什么？

8月下旬，我在38楼北侧苇席大字报栏，看到有人抄写的毛泽东在八届11中全会上于8月5日发表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心想，这个“62年的右倾，64年的形实右”是谁呀？在五十多天里镇压群众，“何其毒也”的“司令部”是指谁呢？难道是刘少奇？难道他另外有个与毛对抗的“司令部”？过了一、二天，哲学系、历史系有人在38楼下，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历史系有张大字报是批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形左实右路线，批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正看着，有个历史系高年级同学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他参加过四清，传达、贯彻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那是打击一大片”，凡是生产队的干部都要烧一烧，整一整。“不管树上有没有枣，有枣没枣打三杆。”有同学记得，北大在8月最先贴出刘少奇大字报的是法律系的。

13、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反思

反思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二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要追溯到1953年3月5日，这一天斯大林去世。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领袖、导师。一直怀着成为千古一帝梦想的毛泽东要填补这一空白，要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世界革命的领导权。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仍是一穷二白，不具备实力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为了从经济领域赶超苏联，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结果失败，遭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六百多万人（注21）。在这一大背景下，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奋起纠错，与毛泽东发生了路线分歧。刘少奇把三年困难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坚持“大跃进”、“三面红旗”是“九个指头”正确，错误仅是“一个指头”，路线正确。但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党心倒向了刘少奇，众多干部在检讨“大跃进”中的错误时，对弄虚作假、比赛吹牛等荒唐事进行嘲笑，有意无意地对毛冷嘲热讽。这使毛泽东深受刺激。毛认为“大权旁落”，他咽不下这口气，萌生了除掉刘少奇并同时整治干部队伍离心倾向的想法。正如毛泽东在1967年2月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巴卢库谈话时所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注22）江青说得更直白，她于1967年4月12日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注23）一一毛在文革中终于扬眉吐气，一吐胸中块垒，打倒了政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点。

七千人大会结束七个多月后，毛泽东开始反击，于1962年9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斗争要年

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尔后，开展了全民学九评苏共中央的文件；开展了四清运动；开展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包括：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历史、哲学、教育、等）。直至1966年5月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打倒了彭、罗、陆、杨，并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通过回顾毛泽东准备并发动文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为着夺回他“大权旁落”之大权，为着坚持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七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空想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为着掩盖他造成三千六百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之罪错，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的动机。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他之所以能发动文革，因具备了上、下两个层面的条件。

上层的条件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早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便曾通过一个《决定》，赋予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虽然此“决定”在一年二个月后随着新的书记处成立而无形中取消，但在党内高层造成了深远影响。中共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规则。从十七年到文革，全党大力造神，把毛泽东推上了无比神圣的宝座，形成全民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记得我曾于1965年初在西单长安大戏院观赏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该剧总导演是周恩来。演出的艺术水准很高，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这个歌舞剧影响很大。我看完演出后，心情十分激动，对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由衷地崇拜。当时在全国形成了毛泽东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就是圣旨，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违抗，全党、全国都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机制，谁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谁就是反革命。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时，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全党竟无人反对《通知》。文革由此开始。其根本教训是：党没有监督、制衡、约束最高领导人的机制。谁也管不了他，他可以为所欲为。

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大字报”时，他们的斗争方向与胆量就是来自于《五一六通知》。他们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紧跟毛泽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

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下层条件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社会已积累了厚重的官民矛盾。从1949年许多地方的土改扩大化到肃反扩大化，从1957年的反右到反右倾机会主义，从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到城乡社教运动，官民矛盾不断积累、激化，最后爆发。

回看十七年，各级政府没有监督机制，就难免滋生官僚主义、一言堂、脱离群众、搞特权、贪污腐败等现象。司法不独立，以人治代替法制，社会如何达到公平、公正？舆论一律，无新闻自由，人民无法监督各级官员。没有人权观念，公检法滥权，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得不到保障。总之由于没有宪政民主，官民矛盾无以化解，反而越积越多。最后，人民的不满情绪被毛泽东所利用，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炮轰各级党政领导的造反运动。亿万人民在文革中掀起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滔天巨浪，这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能量使然。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官民矛盾，利用群众的力量教训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干部队伍，并打倒了政敌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后再重建、恢复他的党国体制。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在文革之初被毛泽东称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与北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层的关联，特别是与1964年

至1965年的社教运动及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运动直接有关。毛泽东利用了北大内部的官民矛盾，让中央台广播了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烈火。

注释（续上期）：

注9：同注8。

注10：《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15日条目。

注11：《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6月26日条目。

注12：《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1966年7月10日条目。

社1996年版。

注13：陈东林、林蒲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第11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注14：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第238页

注15：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855期2012年7月10日。

注16：《戚本禹回忆录》418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注17、18、19：周一良自选集：《郊叟爆言》92页，新世界出版社。

注20：董正华、刘一皋主编：《中国留美学人口述史：周一良先生访谈录》19页。

注21：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1月六版下篇904页。

注2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81页。

注23：同注22。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